

激扬文字 广传福音

陈建明 著

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





陈建明 著

激扬文字 广传福音

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宇宙光出版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 20 - 2010 - 16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扬文字 广传福音: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 / 陈建明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495 - 1359 - 8

I. ①激… II. ①陈… III. ①基督教史—传播—中国—近代 ②出版事业—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近代
IV. ①B979.2 ②G23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111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魏 东

封面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前 言

开展文字出版(或称文字事工)是基督新教布道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字出版始终是在华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本土教会的布道事工之一。从马礼逊来华始,基督新教始终看重文字布道。最初,文字布道基本上是以“教化民众,传播福音”为目标,企图用文字来弥补口头直接宣教的不足,以劝信为直接目的。随着社会福音神学的兴起,参与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基督教文字事工不再局限于劝信的目的,它逐步同教育、医疗并列成为基督教会宣传教义、呼吁改革、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时,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和民教冲突方面。在这以后,随着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人们开始对基督教在华历史作出全面的研究和评述,既指出其凭借帝国主义武力才得以进入中国,其中一些人还替西方国家搜集情报,甚至引发民教冲突的一面,同时也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以及除了传教以外所从事的积极的社会活动。本书内容主要研究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及其社

会影响。

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做过这样的评价：

他们力图通过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带往中国的方法,来完成他们的宗教使命,这是一种极其开明的行动;不过,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虽说内容错综复杂,但却具有一种较高的投机的性质。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①

这个评价用于对近代传教士在华的文字事工仍然是适用的。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新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翻译、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方宗教、科学、文化和政治知识的著作,并创办印刷厂、出版社、报刊社将其印刷出版,除了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还对处在停滞状态的清末中国社会起到了促其猛醒的作用。通过对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的研究思考,笔者赞同中国出版史专家叶再生先生的观点,他指出: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宗教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现代中西两大文明交流中,基督教传教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传教士的文化和修养,要远远超出到中国来的海员和商人。被派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的人。为了传教,也为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不乏有些人怀有改进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文)第一、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页673、693。

中国教育事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为此,他们的宗教激情和献身精神,使他们刻苦地学习汉语、汉文、满文,读经史,研究汉学,刻制中文铅活字等,同时也将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①

笔者认为,研究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不能只注意传教士的活动,还应当重视中国本土教会的出版活动,否则就不是完整的研究。中国教会在历史上曾经创办了哪些印刷出版机构?翻译、创作和出版了多少作品?产生了哪些重要的文字工作者?中国本土基督教文字事工对中国教会的成长,对中国社会有何贡献和影响?这些都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内容对此略有涉及。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差别。总的来说,19世纪晚期新教关于新知识的出版物是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而民国期间新教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如清末。一般认为,1911年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出版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为减弱。其原因是:民国成立后,中国非宗教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出版机构数量大增,而且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在编译能力和出版发行能力上已经日趋成熟。国民政府也兴办了许多报刊社和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国民政府加以控制,设立了国立编译馆,编译和审定学校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并组织官办的出版社和一些大的私营出版社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大学教育参考书。而基督教出版界进入民国后,也在打算集中精力为教会群体提供宗教读物。包括广学会在内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已经不再热衷于出版世俗普通知识读物,因而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喧哗。

在民国时期,新教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数量只占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小部分。1927至1936年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比较稳定的时期,因而也是中国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以这段时期为例,仅商务印书馆一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页166—167。

家的出版数量就达到了 9654 种,约占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半。而同期新教各出版机构的全部出版物才 2845 种,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总数的 30%,或是全国出版物总数的 13%。全国出版行业的总产出状况表明,涉及所有宗教类型的宗教类出版物,在全国出版物产量中只占有非常小的份额。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说明,在新教出版物中占有绝大部分比例的宗教类读物是民国时期读者大众需求最少的读物。中外教会人士希望通过“以基督教文字扎根中国”来造就一批又一批中国基督徒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多样性。不能因为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主观愿望未能实现,就忽略了文字事工在客观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能因为基督教出版事业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影响力不如过去,就忽略了其社会存在,全盘抹杀其历史作用。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的缘由之一。

笔者在 1985 年攻读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涉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毕业论文为《孙中山与基督教》。1987 年 7 月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四川大学出版社工作。结合自己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和喜爱研究的中国基督教历史,我开始关注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香港李志刚、梁元生先生的著述和中国大陆的叶再生、熊月之先生的著述,均给予我深刻的启迪,尤其是近年来与美籍华人何凯立先生的交往中,我获益匪浅。在翻译何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一书的过程中,我与其反复切磋,加深了对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领悟。何先生并在译事竣工后将大批珍贵史料馈赠予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此举实令人感动,铭记于心。

2000 年 9 月,我开始专注于“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研究”课题;2003 年起,幸获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参与本人的研究,令我深感欣慰。几年来,课题组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2005 年 6 月,应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邀请,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暑期讲习班。美国《山行文化报》朱易主编听说我从事基督教文字事工研究,力促我撰写有关

文章送该报发表,以引起教会对文字传媒工作的重视。由此,我体会到自己从事的研究并非仅局限在学术圈子里,不禁感到一丝快意。然而,更高兴的事还在今年岁末,经好友顾卫民教授的推荐,台湾林治平教授来电邀请我参与论文集丛书的出版工作,即以基督教文字事工为专题编辑一本书。翻检十多年来陆续发表的文章,回首经历过的上下求索历程,一幕幕苦乐场景涌上心头。个中滋味,不提也罢,留待自己细品。

这里汇集的九篇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93年,最近的则在2005年11月。由于历时12年,有的文章个别材料、观点已显陈旧;各篇文章独立成文,内容时有互相重叠。有鉴于此,笔者对有的文章做了适当增删修订,并在篇末略加说明。为了方便阅读理解,论文排列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非按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序。《中国基督教通史编撰述评》一文,评述民国至当前中国与外国学者及教会内部与教外学者编撰中国基督教通史的状况,虽未直接讨论基督教文字事工,但却与之密切相关,故收入本书。

本书内容如有不妥之处,请阅者指正;如有宝贵建议,亦请不吝赐教。

陈建明

目录

CONTENTS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文字传教的认识 / 1

- 一、早期对华文字事工的乐观估计 / 2
- 二、对文字作品效力的认识 / 5
- 三、不断调整的文字传教策略 / 9
- 四、对文字事工本色化的态度 / 14

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概论 / 18

- 一、基督教在华出版机构 / 18
- 二、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 / 32
- 三、《圣经》及教科书的出版 / 40
- 四、期刊的出版 / 44

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物的传播状况 / 53

- 一、出版发行机构 / 54
- 二、图书发行工作 / 57

三、促销手段 / 60

四、赠书活动 / 64

五、出版物的推销效果 / 68

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出版机构:华英书局 / 71

一、从教文馆到华英书局 / 71

二、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 / 72

三、书刊印刷出版工作 / 78

四、华英书局的历史作用 / 86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 89

一、抗战以前华西本地基督教文字机构 / 89

二、抗战期间华西的基督教文字事工 / 99

三、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 110

四、载 社 / 113

五、盛衰过后的思考 / 116

广学会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 120

一、广学会宗旨及出版物概况 / 120

二、传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 / 129

三、出版物的社会影响 / 142

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150

一、吸引了一些中国人信教 / 151

二、促进了中国现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 / 153

三、将西方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知识输入中国 / 158

四、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 162

五、引进了西方教育思想和人格培养方法 / 166

六、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救国思路 / 167

七、维护民族独立,鼓吹民主政治 / 172

一部研究民国时期基督教出版事工的佳作:

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 176

中国基督教通史编撰述评 / 186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文字传教的认识

西方基督教差会通常将其传教活动分为五个领域,即布道、教育、医疗、慈善和文字五大事工。所谓文字事工包括文字创作与翻译,书报刊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其实即新闻出版事业。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新教图书出版事业。为说明问题,偶尔也会涉及文字事工的其他方面。

过去,中国的传教史研究较少系统论述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正如宋原放先生所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举办出版业,过去往往以文化侵略一言以‘毙’之。在此影响下,50 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只收了《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一篇不到 3500 字的文章。有的书避而不谈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出版业、现代印刷机器以及传教士发明了电镀华文铜模,当然,也避而不谈外国传教士的出版业几乎垄断我国出版界 40 年之久。”^①从上个世纪末到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论著涉及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除几篇论文外,还有一些中国基

① 宋原放:《关于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几个问题》,载《出版科学》1994 年第 2 期,页 7。

督教史论著中辟有章节加以论述,专门论述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的论著则有笔者参与翻译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①但尚未见到专门探讨近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文字传教的认识之类的文章。

在民国建立之前,西方传教士的文字活动最为显著,中国教徒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民国建立以后,随着“非基运动”的开展及本色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本土教会的文字活动逐渐加强,出现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文字活动并存的状况。

西方差会在中国兴办文字出版事业必然有其目的。我们今天来对其做一番历史的回顾和检讨,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如果仔细研究不同时期一些传教士的言论,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如何开展文字事工有一个变换策略、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

一、早期对华文字事工的乐观估计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一开始就重视文字工作,并对此抱有很大的而又有一些盲目的希望。1807年1月20日,伦敦传道会专门为马礼逊赴中国举行欢送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其中明确谈到了文字工作的要求:“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然后你可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②从这里可以看出,

① 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5—26。

马礼逊牧师和他的中国助手在翻译中文版《圣经》。由霍尔依程耐里 (George Chinnery, 1774—1832) 原画刻板。(复自[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锋》)



伦敦传道会的希望值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幻想全中国人都能阅读《圣经》。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9月8日到达广州。

马礼逊到中国后,即忠实执行伦敦传道会的指示,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他顽强地练习写中文字,“盼望将来能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庞大的中国的数万人能够阅读中文《圣经》,使他们得知救赎的奇妙”。1808年末他在写给伦敦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原来制订的要编中文文法、《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劝世文等的计划一旦实现,我认为就可以在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开始进行推广传播福音的工作了。到那时,上帝将会感化中国统治者的心,为我们启开巨大的和有效的门户。”马礼逊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不忘使命,一直坚持文字工作。1811年1月7日,马礼逊给伦敦传道会的回信中写道:“我要向董事会感谢批准我继续攻读难学的中文和编中文文法及字典。愿上帝赐我健康和机会能完成这些工作,有助于在亿万中国人中广传神圣的真理。我以能为耶稣基督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而感到无上的光荣。”^①

^①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页45、51、68。

1811年伦敦会出版的年报记载了马礼逊在中国的情况,对其文字工作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其中写道:“当我们想到,马礼逊是被派往那个广大的国家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又是第一位将《圣经》陆续译成中文的翻译者,并把这部生命和救恩的书介绍给有3亿读者的中国人。我们不能不恳求全英国的人民,向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呼求,让主能欣然地延长马礼逊的寿命,使他不但能全部译完《圣经》,并能印刷出版,还能使这部中文版《圣经》在那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①到1834年病逝时为止,马礼逊的主要活动就是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并在马六甲开办了一所英华书院。他不但自己译书,还用自己的钱开办了两处印刷所,出版了大量的书刊。

为了使马礼逊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伦敦会还物色了一位愿意献身、具备足够才能的米怜牧师到中国做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对中文出版曾有一段乐观的谈话:“在每一种优雅的文字中,利用该文字出版书刊以传播人类和神明的知识,对所有读者来说,都是明显有效的。至于用中文出版的书刊,也许要比任何别种文字更能有效地与中文读者沟通,因为中国能看书的人,其比例远比人类的其他民族大得多。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因为中国的书写文字是全国统一的,利用写中国字的办法可以和任何讲方言的中国人沟通,这是中国的特点。”^②应当说,米怜对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的认识是深刻的,至于他认为当时中国识字人口比例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则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其实,清末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占主要人口的国家,而农民的识字率是很低的,即使进入民国时期仍然如此。有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每十个中国人当中大约只有一个具备读书写字能力。1920年代曾有一项对全国不同地区46001个家庭的专门调查,报告显示,69.3%的男性农民和98.7%的女性农民是文盲。^③在以后的传教

①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页71。

② 同上,页135—136。

③ 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页22。

活动中,传教士终于认识到中国人识字率低下,文字作品的效果实在有限。不过,前述乐观的估计倒是可以促使米怜及其他传教士积极从事中文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对文字作品效力的认识

对于开展文字宣教的好处,传教士首先想到的是文字作品不受地域限制的传播媒介的作用。

虽然,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其活动实际上却遭到很大的阻力。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从1807年到1840年间,包括马礼逊在内的来华英美传教士都逗留在澳门、马六甲及新加坡等地,有时以商业身份作掩护悄悄溜到广州活动。因此,他们的传教工作也大致在这些地区开展。在诸多教会事工中,只有文字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传到中国大陆。对此,外国差会和传教士们是有充分认识的。

裨治文是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29年10月初,裨治文被封立为牧师,准备前往中国。公理会签发给他一封指示信,其中提到:“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①裨治文于1830年来华之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pp. 20-27.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22。

后,不仅师从马礼逊学习中文而且在传教方针上也深受马礼逊的影响,认为文字出版工作乃是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首要任务。作为美部会中国宣教团的先驱传教士和主要负责人,裨治文于1832年开创了两项重要的宣教工作,一是创办了美部会印刷厂,另外就是与卫三畏合作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马礼逊夫人在总结马礼逊等人的文字活动后也认为书籍对于打破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非常有效:“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是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源源不断地输入全国各地。”^①事实上,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在旅行布道或在科举考场,经常采取散发福音书籍和小册子的方式来传福音。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五口通商,传教士终于得以登陆中国沿海口岸活动。但是,活动范围的局限远远满足不了传播福音的需要,为此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文字事工。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创办《六合丛谈》之时的一段话颇能表明这种看法:“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众,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矣。吾国士民旅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稔。然通商设教,仅在五口,而士人足迹未至者,不知凡几,兼以言语各异,教化不同,安能使之尽能明吾意哉?是以必须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俾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之性情,不至于隔阂。”^②而该刊的目的就是利用文字的传播来冲破仅能在五口传教的束缚,起到交流中西文化、传播西方宗教的作用。

不少提倡文字事工的传教士还将文字出版与其他宣教方式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有许多独特的优点。

①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页135—136。

② 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载《六合丛谈》创刊号,1857年。